

国际关系

冷战结束后伊朗与美国关系^{*}

何志龙

[摘要] 冷战结束后伊朗与美国关系经历了相互攻讦、谨慎接触以及“9·11”后激烈对抗三个阶段。伊美为了各自的战略和安全利益,在中东和平进程、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伊核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展开激烈对抗,其实质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与伊朗的地缘政治战略利益、美国的中东战略利益与伊朗的国家安全利益之争。受伊美国内政治、伊核问题、伊朗与以色列关系及中东和平进程等因素的影响,未来伊美关系难以得到实质性改善。

[关键词] 伊朗核问题;恐怖主义;中东和平进程;伊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7)05-0058-62

冷战结束后的伊朗与美国关系,是中东国家与大国关系中最重要、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中东地区局势乃至世界和平有着重要影响。

后冷战时代伊美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

冷战结束后的伊朗与美国关系基本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海湾战争结束至美国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结束为第一阶段,其特征是相互攻讦,大打口水战。克林顿政府在继承老布什政府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同时,认为美国有能力对伊朗和伊拉克同时进行遏制,进而实施“西促和谈”、“东遏两伊”政策。在美国看来,推动阿以和谈与遏制伊朗具有一致性:促进和谈将进一步孤立伊朗,使其屈服或内变,而遏制伊朗有利于推动阿以和谈。因此,从1993年至1996年,美国政要发表了一系列指责伊朗的言论,认为海湾战争结束后,伊朗已成为海湾地区惟一的威胁源,^[1]其政策和行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2]是美国目前最大的敌人,是“对未来最大的潜在威胁”。^[3]“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就是使用外交手段和经济措施以及军事威慑来遏制伊朗”。^[4]因而美国在外交上乘海湾战争胜利的优势地位,巩固和发展与传统温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积极改善与激进阿

拉伯国家关系,推动阿以和谈,孤立伊朗。经济上实施对伊朗和利比亚投资的外国公司进行制裁的“达马托法案”,阻止世行向伊朗提供贷款,反对伊朗加入世贸组织。政治上支持伊朗反对派,拨专款支持动摇伊朗政权,并制定了一项以推翻伊朗现政权为目标的长期计划。^[5]军事上保持在海湾的军事存在和加大武器装备储备,频繁与海湾国家举行联合军演,威慑伊朗,并推动土耳其与以色列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结成美、以、土军事“铁三角”,形成对伊朗的夹击态势。

伊朗对美国的孤立、制裁和威慑作出了强烈回应。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存,指责以色列,反对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大力支持亲美阿拉伯国家的反政府组织,而且针锋相对地拨专款反击美国的反伊朗活动和资助对付美国人的活动;积极发展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关系,甚至改善与宿敌伊拉克关系,突破美国的制裁和孤立;与叙利亚结盟以抗衡以土军事联盟。^[6]

冷战结束后初期美伊关系趋于恶化,体现了苏联解体后美国维护单极霸权,与伊朗谋求地区地缘政治战略利益之间的冲突。海湾战争中美国保留萨达姆政权就有制衡伊朗之意,而伊朗改善与伊拉克的关系也意在共同应对美国的遏制政策。

* 本论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当代中东局势发展及我国战略对策研究》(批准号 04&ZD02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并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编号 2005037780)。

从1997年至“9·11”事件前为伊美关系的第二个阶段,其特征是美伊开始谨慎接触。克林顿第二任期开始后,美国和伊朗国内均有改善两国关系的呼声。首先,美国的制裁不仅没有达到孤立和遏制伊朗的目的,反而限制了美国企业,损害了美国自身利益,而俄罗斯等国公司大举进入伊朗,特别是油气领域。其次,制裁也遭到了美国盟友的不满和抵制,建议美国改善与伊关系。再次,1996年以色列强硬派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上台后,克林顿政府推动的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僵局,巴以暴力冲突加剧,阿拉伯国家对美国没有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而普遍不满。最后,伊朗国内政治变化也为伊美改善关系创造了条件。1997年5月,改革派政治家穆罕默德·哈塔米当选总统,倡导“文明间对话”。在此背景下,美伊相互释放善意。1997年5月,美国总统克林顿称哈塔米当选是“令人感兴趣和有希望的”,^[7]并通过海湾国家调解美伊关系。克林顿认为“美国人民与伊朗人民的这种隔绝状态是可悲的”,提议美伊坐下来进行“真诚的”对话,^[8]加强两国人民交流,重建良好关系,^[9]并乐观地认为“美伊重归于好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10]为此美国把伊朗的主要反对派组织人民圣战者列入国外30个恐怖主义组织之中;把伊朗从美国制定的有毒品问题的国家名单中勾掉;部分取消对伊经济制裁,允许从伊朗进口非石油产品;放松对伊朗学者和艺术家、运动员进入美国的限制,鼓励两国人才交流;同意通过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最终解决被冻结伊朗财产的法律纠纷。

伊朗对美国的善意也给予了积极回应,认为如果美国承认伊在该地区的重要利益,伊朗愿意与之合作,并相继提出改善伊美关系的条件。总统哈塔米希望同美国人民进行“富有哲理的、历史性的对话”,在1998年9月联大的发言中也没有攻击美国,认为发生在伊美之间的人质事件已经成为过去。^[11]

但伊美关系所出现的改善迹象,只是两国长期紧张关系的短暂缓和,因双方利益冲突没有改变,其对立的本质也就不可能改变。美国从“全面遏制”到“区别遏制”和“谨慎接触”,只是策略上的变化,通过威胁利诱迫其内变的战略目标没有改变。而伊朗对改善伊美关系也更为谨慎。以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为代表的保守派,坚决反对改善伊美关系,认为伊美关系不仅是“缺乏信任”,美国仍是伊朗的敌人。^[12]

“9·11”事件后伊美关系进入严重对抗的第三个阶段。随着美国对伊斯兰认知的变化和美國中东政策的调整,美国更为关注伊朗的动向。尽管伊朗在阿富

汗战争中给予美国一定配合和支持,但阿富汗战争的硝烟未散,美国旋即指责伊朗为从阿富汗越境的“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提供庇护。2002年1月,美国总统布什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称为“邪恶轴心”,反恐矛头直指伊朗。伊朗也针锋相对地指责美国在世界各地制造紧张危机,已经成为“霸权轴心”。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伊朗数百万人示威游行反对美英入侵伊拉克。随着萨达姆政权被迅速推翻,美国鹰派政要和新保守主义者倍受鼓舞,加大了对伊朗的指责。2004年7月19日,总统布什甚至宣称伊朗与“9·11”事件可能存在联系。^[13]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政要对萨达姆政权的各种指责似乎再次出现在伊朗面前。

随着美国在伊拉克陷入困境,美国认识到以什叶派为国教的伊朗对伊拉克什叶派的强大影响力,美伊通过瑞士驻德黑兰大使馆保持秘密接触。因此尽管两国剑拔弩张,但两国关系仍在可控制范围之内,短期不会走向战争。

影响伊美关系的三个核心问题

冷战结束后的伊美关系,不论是相互攻讦、谨慎接触还是严重对抗,其中中东和平进程、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伊朗核问题,一直是影响伊美关系的三个核心问题。

1. 伊美在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上的分歧

阿以问题是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海湾战争后美国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有三方面的战略考虑:一是冷战后中东和平已为大势所趋,通过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安抚阿拉伯国家,加强与传统温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改善与叙利亚等激进阿拉伯国家关系,巩固海湾战争后美国在中东所取得的优势地位。二是保护战略盟友以色列的利益。三是通过推动中东和平实现美国、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战略合作,对伊朗形成战略上的孤立和遏制,利于美国长期主导中东,而且美国也乐见伊朗因反对中东和平进程而更显孤立。^[14]

美国旨在孤立伊朗的中东和平进程,自然遭到伊朗的强烈反对。伊朗在海湾战争结束后不久即召集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代表聚会德黑兰,加大了反美反以宣传,呼吁“吉哈德”对以色列发动圣战。^[15]伊朗反对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的目的有三:一是对美国将伊朗排除在中东和平进程和海湾地区安全安排之外的报复,希望以此迫使美国承认伊朗在该地区的重要利益;二是担心美国主导的阿以和平进程实现阿以和解,形成美以共同主导中东的局面,也就是

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设想的“新中东”，伊朗将面临被进一步地孤立。伊朗旨在通过强烈反对甚至破坏阿以和谈来激起阿以对抗甚至冲突，在以色列的强大压力下，迫使阿拉伯国家积极改善与伊朗的关系，与伊朗结成战略联盟，反对美国，孤立以色列；三是通过高举为巴勒斯坦人民伸张正义的伊斯兰旗帜，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对巴的长期占领，赢得穆斯林世界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激起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情绪，迫使美国从海湾地区撤军，从而实现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安全利益和地缘政治经济利益。

由此可见，伊朗反对中东和平进程只是应对美国遏制政策的一种策略性工具，其立场随着伊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当伊美关系紧张时，伊朗的反对声调会更高，而当伊美关系缓和时，伊朗又会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1997年12月，总统哈塔米就曾私下告诉巴解主席阿拉法特：“伊朗会默认巴以达成的任何为巴勒斯坦人所接受的协议”。^[16]

2. 伊美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的激烈交锋

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共同的敌人，但如何定义恐怖主义，美国和伊朗存在较大分歧。美国认为“伊朗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恐怖主义发起国。”^[17]美国指责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包含三层意思：其一，美国认为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已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中心，其向周围伊斯兰国家特别是海湾阿拉伯国家输出伊斯兰革命是恐怖主义行为。其二，美国认为伊朗支持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吉哈德”、“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的袭击是恐怖主义行为。其三，美国认为伊朗支持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针对西方的恐怖活动。美国一直怀疑制造伦敦和阿根廷针对犹太人炸弹爆炸事件的“黎巴嫩真主党幕后的唆使者是伊朗”。^[18]1996年8月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达马托法案”后解释说：“伊朗和利比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恐怖主义支持者。我今天签署这项法案就是不让上述两国获得资金，否则他们将资助国际恐怖主义”。^[19]1998年4月，美国将伊朗列入世界上支持和策划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黑名单，并提出伊朗消除支持恐怖主义行为的6项要求。^[20]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对伊朗的指责又包括了所谓伊朗对越境“基地”组织成员提供庇护，以及对伊拉克反政府什叶派武装组织的支持等。

但伊朗认为从事恐怖主义活动与捍卫国家和民族权益的斗争具有本质的不同，阿拉伯抵抗运动是反对入侵者和占领者的合法斗争，不是恐怖主义。对于国际反恐，伊朗认为应“召开国际反恐首脑会议”，“只有

采取正确的方法，才能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保护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21]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做文章，实际上只是美国采取的较易为其他国家理解和支持的打压伊朗的方式，也是伊朗较为有效地化解美国打压的手段，其根源仍为两国不同战略利益的冲突。

3. 伊美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伊核问题上的冲突

美国指责伊朗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计划是一个渐进升级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初主要指责伊朗发展生化武器。伊朗鉴于两伊战争中曾遭受伊拉克生化武器袭击并造成严重损失的惨痛教训，曾经发展生化武器。总统拉夫桑贾尼曾称生化武器为“穷人的原子弹，也容易制造。我们至少应考虑用它来加强国防”。^[22]自1998年以来伊朗多次成功试射射程达1500公里的“流星—3”型中程弹道导弹，防止和限制伊朗获取和开发导弹技术成为美国对伊政策的目标，美参议院还通过了对向伊提供导弹技术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的法案。伊拉克战争后伊核问题渐成各方关注焦点。伊朗认为作为《核不扩散条约》的签字国，伊朗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而且在与欧盟的谈判中伊朗明确提出“在中东建立一个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安全体制有助于本地区的安全和稳定”。^[23]但美国质疑伊核计划的目的，认为伊朗拥有丰富油气资源，无需开发核能，认定伊核计划旨在核武。而伊朗认为尽管其拥有丰富油气资源，但属不可再生资源，应该有计划有目的地节约开采，而和平利用核能既环保，也是当今科技兴国时代国家科技水平的象征。正如伊朗总统哈塔米所说：“我们想变得强大，强大就意味着拥有先进技术，而核技术则是所有技术中最先进的”。^[24]美国强烈反对伊朗核计划。美国对伊核问题的立场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美国要求伊朗立即无条件地停止核计划，而且不与“邪恶轴心”直接谈判，而是默许英法德三国代表欧盟与伊朗谈判。因为美国担心，与伊朗直接谈判，一方面就意味着美国必须承认伊朗在中东的某些地区利益，因为谈判本身就意味着对彼此地位的承认和只有相互妥协才能达成协议；另一方面，美国可能承担谈判失败的风险。美国默许英法德与伊谈判，如果谈判成功，美国自然享有幕后操纵者的成果；如果谈判失败，美国不仅无需承担责任，而且失败可能会迫使英法德最终站在美国一边，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第二个阶段，美国要求伊朗停止（后来要求暂停）铀浓缩活动，然后美国参与英法德与伊朗的谈判。伊朗断然拒绝了美国的要求。伊朗认为伊核计划如果是“问

题’,那正是需要通过谈判加以解决的问题,如果伊朗停止了铀浓缩活动,那还有什么可谈判的。实际上,伊朗担心如果停止(或暂停)铀浓缩活动然后与美英法德等谈判,不知这种谈判要谈到何年何月,如果美国有意从中作梗,使谈判长期谈而不决,不仅致使伊朗延误发展核计划的时机,而且美国可能乘谈判之机抓紧解决伊拉克问题,待伊拉克问题解决后,美国必将更加强硬地对待伊核问题,那时伊朗将更加被动和孤立。第三个阶段,在美国的努力下,伊核问题被提交联合国后,美国与英法德俄中共同谈判解决伊核问题。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伊核问题,是美国采取单边主义发动伊拉克战争,并深陷伊拉克乱局和日益孤立的情况下,为修复与欧洲盟国及俄中的关系,不得已而为之。美国希望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向伊朗步步紧逼,不断施压,最终迫使伊朗就范:要么放弃核计划,要么伊朗顽固的强硬立场最终导致英法德及俄中的不满甚至反对,使伊朗更加孤立。在美国的努力下,五常加德国多次讨论并已通过两个有关制裁伊朗的决议。与此同时,美国政要多次声言保留其通过军事手段防止伊发展核武的权利,不断加大对伊朗的压力和威胁。但时至今日尚未找到各方均能接受的解决途径。

伊美在伊核问题上的冲突,其实质是双方不同利益之争。首先是美国的单极世界霸权与伊朗的地区战略利益之争。冷战结束后美国从维护其单极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出发,竭力防止潜在地区性大国的崛起。美国认为如果伊朗研发并拥有核武,将产生示范和连锁反应,必将造成世界性核灾难,甚至恐怖分子可能从这些国家获得核武用来攻击美国本土。更让美国担心的是,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必将无视美国的霸权地位,影响美国的全球战略。而冷战结束后伊朗积极构建符合其地区战略利益的中东秩序,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加大了对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及巴勒斯坦“哈马斯”的影响力,有人称之为“什叶派联盟”或“新月什叶派”。但是,如果伊朗没有强大的武器库,特别是没有能够威慑其他大国甚至超级大国的法宝,也就无法实现其地区战略利益。其次是美国主导中东与伊朗的国家安全利益之争。中东是美国全球战略中“利益攸关”地区,保证中东石油以合理价格不间断地流向西方和保持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中东政策的基本目标。而扼守海湾石油出海口的伊朗,长期与美国关系紧张。美国认为伊朗严重影响着美国的中东战略,因而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政治孤立和军事威慑,企图迫其屈服或

从内部发生变革。而伊朗不仅不屈服于美国的打压,坚持其伊斯兰意识形态,而且采取了一系列反制美国打压的措施,维护伊斯兰共和国安全。

影响伊美关系未来走向的主要因素

冷战结束后伊美关系的阶段性特征和核心症结,均体现了各自的不同利益。未来美伊关系将受四个因素的影响。首先,美伊国内因素的影响。从美国国内政治看,犹太人院外游说集团积极防范美国与伊朗接近,担心以色列成为美伊关系改善的牺牲品;美国新保守派和鹰派政要认为,冷战结束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取代共产主义成为西方文明的主要威胁,而伊朗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发源地和中心。从伊朗国内政治看,保守派与改革派在内政外交方面均存在分歧,目前保守派处主导地位,他们把强调反美反以作为巩固其权力和团结民众的有效工具,反对改善伊美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保守派支持总统内贾德不断用过激言论挑衅美国和以色列的做法,2006年12月伊朗地方议会选举中保守派失利即为证明。伊朗国内政治可能趋向温和保守发展。

其次,伊核问题的走向。伊朗把和平利用核能问题看成是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象征,美国的立场越是强硬,伊朗国内的保守派越是得势,也更获民众支持,2005年保守派领导人内贾德当选总统便是典型例证;而美国采取单边主义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军事打击,也迫使伊朗采取一切可能方式加强国家安全和巩固伊斯兰政权。美国认为伊核计划将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挑战,美国必将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伊朗拥有核武。此外,在美伊双方均持强硬立场的情况下,英法德与俄中的立场及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朝鲜核问题与伊拉克局势,均将对伊核问题产生重要影响。

再次,伊朗与以色列关系对伊美关系的影响。以色列对伊美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冷战结束后随着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伊以从巴列维时期的外围战略联盟和两伊战争时期的秘密合作走向激烈竞争和对抗。伊朗认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一切矛盾之源,是伊朗的主要敌人。^[25]而以色列也视伊朗为主要威胁,不仅密切关注着伊核计划的发展动向,而且不断大力渲染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伊核问题对中东稳定及世界和平的威胁,以引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重视和防范。以色列多次声称要采取措施防止伊朗拥有核武,总理沙龙声言“以色列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26]2006年12月,以色列成立了主要应对伊核问题的“战

略事务部”。可以说,目前伊美在伊核问题上的对抗,与以色列的渲染不无关系。伊美关系与伊以关系形成恶性互动,且趋向激化。伊以关系也已成为伊美关系的晴雨表,有人将2006年7—8月间发生的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视为美伊之间的代理人战争,表明伊以关系与美伊关系的紧密互动性。

最后,阿以和平进程的前景也影响着伊美关系的发展。目前阿以和平进程陷入僵局,巴以冲突不断,黎以对抗加剧,叙以相互指责,其间均夹杂着伊朗反美反以的身影,也成为伊美关系改善的障碍。

[注释]

- [1] 赵伟明:《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M],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第395页。
- [2]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Reporting on the National Emergency with Respect to Iran”, May 14, 1993,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iam J. Clinton, 1993*,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4, pp. 669-671.
- [3] 1995年4月13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美国有线电视网发表讲话。
- [4] 王京烈:《面向21世纪的中东》[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页。
- [5] David Lea ed., *A Political Chronology of the Middle East*,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2001, p. 67.
- [6] 赵伟明:《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M],第399页。
- [7] John Templeman, John Rossant and Stan Crock, “Is It Time to Rethink U. S. Sanctions against Iran?” *Business Week*, May 26, 1997.
- [8]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December 16, 1997,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iam J. Clinton, 1994*,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8, p. 1785.
- [9] 唐宝才:《冷战后大国与海湾》[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 [10] 杨兴礼、冀开运、陈俊华:《伊朗与美国关系研究》[M],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 [11] L. Carl Brown ed.,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Regional and Outside Powers*, London & New York: I. B. Tauris Publishers, 2001, p. 254.
- [12] 参见荣松:《哈梅内伊说美仍是伊朗的敌人》[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3月27日,第六版。
- [13] 布什讲话后的第3天,美国“9·11”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

主席基恩布宣布,该委员会经过认真调查没有发现伊朗与该事件有关。参见吴建友:《布什指责伊朗庇护“基地”组织领导人》[N],《光明日报》2004年7月21日;参见周戎:《美国为什么和伊朗过不去》[N],《光明日报》2004年7月23日。

- [14] Trita Parsi, “Israel-Iranian Relations Assessed: Strategic Competition From the Power Cycle Perspective”, *Iran Studies*, Volume 38, Number 2, June 2005, pp. 247-269.
- [15] Clark Staten, “Israel-PLO Peace Agreement: Cause of Further Terrorism?”, *Emergency Net News Service*, September 11, 1993.
- [16] L. Carl Brown ed.,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Regional and Outside Powers*, London & New York: I. B. Tauris Publishers, 2001, p. 254.
- [17] 王京烈:《面向21世纪的中东》[M],第370页。
- [18]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with King Hussein of Jordan and Prime Minister Yitzhak Rabin of Israel”, July 26, 1994,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iam J. Clinton, 1994*,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5, p. 1313.
- [19] “Remarks on Signing the Iran and Libya Sanctions Act of 1996 and an Exchange with Reporters”, August 5, 1996, *Public Paper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iam J. Clinton, 1996*,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p. 1254.
- [20] Shahram Chubin and Jerrold D. Green, *Engaging Iran: A U. S. Strategy*, Rand, 1998, p. 159.
- [21] Jalal Barzegar, “The Untold About Iran’s Performance on Campaign Against Terrorism”, *Persian Morning Daily (Iran)*, Saturday, Nov. 9, 2002, Vol. 8, No. 1423.
- [22] Anthony H. Cordesman, “Threats and Non-Threats from Iran”, in Jamal S. Al-Suwaidi, *Iran and the Gulf: A Search for Stability*, The Emirates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and Research, 1996, p. 276.
- [23] George Perkovich, “Iran’s Security Dilemma”, *Yale Global*, October 27, 2003.
- [24] George Perkovich, “Dealing with Iran’s Nuclear Challenge”, *Report of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28, 2003, p. 8.
- [25] 关于伊朗对以色列的认知可参考何志龙:《伊朗视野中的以色列》[J],《国际论坛》2006年第6期。
- [26] Uzi Mahnaimi and Peter Conradi, “Israel Targets Iran Nuclear Plant”, *London Sunday Times*, July 18, 2004.

作者简介:何志龙,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西安,710069)

收稿日期:2007-07-15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3 Modus Vivendi and Anglo-American Nuclear Collaboration in the Early Period of Post WWII

by Sun Jian

The Anglo-American nuclear collaboration underwent a very hard journe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post WWII, especially during the years from 1945 to 1951. It became the anomaly in the post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The McMahon Act of 1946 was the main obstacle to Anglo-American nuclear collaboration. But owing to the hard work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US government, a *modus vivendi* between Britain, the U. S. and Canada was reached in January of 1948 and Anglo-American nuclear collaboration started in the non-military area. The *Modus Vivendi* was the result of a deal betwee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US government. The agreement on the *Modus Vivendi* c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successful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US government. And actually both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US government regarded the agreement of Modus Vivendi as a fairly great victory.

58 Iranian - U.S. Relations in the Post - Cold War Era

by He Zhilong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Iranian - U. S. relations experienced three phases: mutual accusation, careful contact and antagonism after September 11. For their own security and strategic interests, Iran and America have serious dispute and intense confrontation over the peace process in the Middle East, terrorism an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especially Iran's nuclear capability. The crux of the matter is the conflicts of American global strategic interest and Iranian geopolitical, strategic interest and American strategic interes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ranian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omestic politics of the two sides, Iranian nuclear problem, Iran - Israel relations and peace process in the Middle East, Iranian — U. S. relations will not see quick improvement.

World Economy

63 European Model of Control on Transnational Mergers

by Wang Zhongmei

European Community merger regulation was enacted in 1989. It was believed to be one of the many measures necessary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a single, integrated European market. EC merger regulation is intended to provide a level playing field in a one-stop shop, based on the Member States' promise to cede examination authority to the Community. It has been proved more efficient and consistent and would provide a good model for transnational merger control.

Countries and Regions

68 The Transformation of Irish Mass Media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by Liu Chen

Ireland made great adjustment in its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t the end of the 1980s, bringing alo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y domestic industries. The paper analyses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Irish cultural policy, the change of Irish cultural economic framework and the success of Irish popular cultur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rish mass media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d examine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tors, the three decisive control factors.

73 Civil Society and the Changes of Governance in Southeast Asia

by Guo Hong

Since the late 1980s, civil society has rapidly developed in Southeast Asia. Civil society that is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overall quest for human security challenges state-centric notions of security and authoritarian approaches to domestic political governance. Civil society has become a part of governance network through getting involved directly in many social and economic policy making process, and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changes of agenda and structure of governance. But making the norms and approaches of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a part of Southeast Asian governance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because of a variety of structural obstacles.